



# 分析与新见解 核风险降低中心 不稳定时期的稳定渠道

作者: Rose Gottemoeller 和 Daniil Zhukov  
2023 年 10 月

本工作文件探讨了美国和苏联(现为俄罗斯)核风险降低中心的历史,以阐明它们旨在解决的风险;思考它们在减轻这些风险方面的表现;并确定构思建立核风险降低中心(NRRC)时未预见到的益处或危害。文末就今后核风险降低中心概念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想法,以期在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促进风险降低。<sup>1</sup>

美国和苏联于 1987 年 9 月 15 日正式谈判建立核风险降低中心,形成了一个始终开放且安全的渠道,以便快速传递与执行与各种武器控制条约和措施有关的信息。如今,美国 NRRC 的技术人员每天 24 小时维护线路,第一时间将传入的信息翻译并通报给相关机构,同时将传出的信息传送给俄罗斯和其他 50 多个国际合作伙伴,中心服务于 13 项条

约和协议,涉及核、常规、化学和网络领域。<sup>2</sup>除了条约规定的通知外,美国和俄罗斯的核风险降低中心还定期交换与各种维护问题相关的服务信息,有时会传输与任何特定条约无关的临时消息,并每两小时对线路进行一次人工联络测试。<sup>3</sup>

受该协议签署前数十年间多次核危机的影响,NRRC 从一开始就旨在成为一条降低意外核对峙升级风险的可靠渠道。虽然衡量它们对降低风险事业的最终贡献具有挑战性,但我们仍然认为,核风险降低中心已经证明了它们在发挥其原始作用方面的价值。NRRC 在促进各种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方面的角色演变本身就是对国际安全的重要贡献。NRRC 还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可以在必要时传输临时通



信,以遏制萌芽状态下的危机,并将常规信息传递根植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机构 DNA 中,即使在俄罗斯 2022 年入侵乌克兰后双边互动变得稀少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一个开放的渠道。这些特点使核风险降低中心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可以在其他环境和领域进行复制,例如,用于所有 5 个核大国之间的沟通。

## 降低风险的必要性

冷战的最后十年让双方有足够的理由担心核对峙升级,无论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缓和关系破裂,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初紧张局势加剧,军事集结和危急时刻不时出现。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两个超级大国在 1973 年阿以战争期间险些发生冲突的记忆强化了人们对核战争危险始终存在的认识。近年来,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这可想而知引起了人们对核武器扩散的深切担忧。

在美国,这种焦虑交织在一起,促使人们呼吁减少因误解对方的行动或第三方介入而导致意外的核对峙升级的威胁。相比之下,苏联则将全部精力放在应对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威胁上,既担心美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又害怕自身的军备力量不足。

在华盛顿,降低风险的呼声呼应了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总统于 1982 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去世两天后向苏联提出的建立信任措施的建议。<sup>4</sup>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里根政府对苏联的言论和政策急剧转变,于 1983 年初宣布实施战略防御倡议 (SDI),此举加重了苏联决策者的不安。不过,华盛顿的其他团体仍在继续推动降低意外风险的势头。其中做得尤为成功的是由参议员萨姆·纳恩 (Sam Nunn) 和约翰·华纳 (John Warner) 发起的减少核风险工作组。

该组织于 1983 年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敦促美国和苏联建立核风险降低中心,旨在“对任何可能导致核事故的事件进行 24 小时监视”。<sup>5</sup> 根据设想,这些中心将成为具有广泛的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功能的渠道,双方可以就可能被误解的行动交换信息,并在核恐怖主义事件中保持密切联系,并“就核理论、核力量和核活动建立对话”,强调此类交流的自愿性质。在纳恩和华纳的报告发布的同一时间,国防部也向里根总统提出建议,敦促在华盛顿-莫斯科热线中增加传真功能,并实施其他危机管理措施。<sup>6</sup>

该报告很有先见之明地强调了共同努力降低风险的必要性,因为仅仅几个月后,美国和苏联就发现自己濒临核对抗的边缘。在美国宣布实施 SDI 后,冷战的紧张气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变得尤其不稳定,加剧了人员老迈的苏联政治局对美国意图的担忧。美国领导层和情报部门不知道的是,克里姆林宫愈发担心自己的战略力量在遭受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击时会脆弱不堪,这为加深潜在误解埋下了隐患。<sup>7</sup>

1983 年秋天,在这种不安的氛围下发生了一连串危机和险情。其中一场危机是苏联于 9 月 1 日击落了一架大韩航空的航班,这使得局势升温,也引发了苏联普通官员对核冲突的担忧。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 (Anatoly Chernyaev) 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广阔的世界充满了人类凭借智慧和劳动创造的伟大成果,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沦为两个‘超级大国’其中一方的领导人精神崩溃的牺牲品。”<sup>8</sup>

另一次危机发生在 1983 年 9 月 26 日,当时苏联的预警系统错误地侦测到美国发射的五枚导弹;幸而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 (Stanislav Petrov) 上校做出了不向上级报告警报的决定。<sup>9</sup> 最后,同年 11 月,北约展开了代号“优秀箭手 83”的核演习,北约通信引起了苏联的误解,认为美国准备发动真正的核打击,苏联因此提高了己方的战备水平。<sup>10</sup>

这一系列事件和其他种种事件促使华盛顿和莫斯科越来越强烈地认

识到核对抗的风险。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后来成为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他在 1983 年首次以书面形式记录了自己对核战争可能性的思考,这很可能促使了克里姆林宫在随后的谈判中寻求更大的核限制。<sup>11</sup> 而美国方面,1983 年的危机进一步刺激了降低核风险的势头,促使参议员纳恩和华纳共同提出了 1984 年参议院第 329 号决议。该决议对“越来越多的情况,包括误判、误算、误解、恐怖组织拥有核武器或有国家支持的威胁”表示担忧,这些情况都可能引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对抗。<sup>12</sup> 为了解决这些担忧,该决议敦促里根总统与苏联就建立核风险降低中心进行谈判。

## 真正实现降低风险

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同意在 1985 年的日内瓦峰会上就此事展开专家级讨论。<sup>13</sup> 这些讨论演变成了围绕 NRRC 的正式谈判,同时进行的谈判主题还有重启的《中程导弹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此次谈判在更广泛的美苏军备控制进程中发挥了辅助作用。

这一作用明确反映在了 1987 年达成的最终协议中,根据该协议,这些中心充当了安全通信渠道,双方可以通过该渠道传输其他条约和协议所要求的通知。<sup>14</sup> 在 1987 年 9 月 15 日的签字仪式上,里根总统和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Eduard Shevardnadze) 强调了 NRRC 在更广泛的体系中的作用,即减少“因事故、误判或误解而可能导致的冲突风险”,以及落实“永远不应打核战争”的共识。<sup>15</sup> 1987 年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INF) 和 1988 年签署的《弹道导弹发射通知协议》成为了首批利用这一新兴渠道的协议。

这样一来,在美国国务院和苏联国防部内成立的 NRRC 所发挥的作用要比纳恩-华纳工作组最初设想的小得多。NRRC 远非提议的广泛讨论核理论和核事件管理的渠道,而是成为了一个致力于危机预防的机制,双方可以通过该机制安全、快速地共享其他双边协议所要求的信息。

协议达成后,美国多位评论人士怀疑里根政府大幅限制了纳恩-华纳提案,以限制国会影响谈判的能力,这也致使最初降低风险的愿景未能实现。<sup>16</sup> 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谈判报告指出,美国代表团在试探性会议期间确实提出了“这些中心的各种作用”,包括通知军事演习,是苏联代表团坚持将中心的原始功能严格限定在核领域。<sup>17</sup> 事实上,即便 NRRC 的实际作用范围较窄,却也构成了纳恩-华纳工作组愿景的核心;其两名成员巴里·布莱奇曼 (Barry Blechman) 和迈克尔·克雷彭 (Michael Krepon) 在 1986 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写道,“大多数[拟议的]中心活动”会呈现技术性和危机前特性,侧重于军事活动通知和危机预防。<sup>18</sup> 1987 年,林恩·鲁斯滕 (Lynn Rusten) 和保罗·斯特恩 (Paul Stern) 联合主持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评估称,“这些中心能够在避免危机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而不是全面的危机管理。<sup>19</sup>

因此,尽管没有实现纳恩-华纳工作组的全部目标,NRRC 仍保留了其作为核数据交换中心的基本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库交换了大量数据,其中包括根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发出的超过 25,000 份通知,让该中心的这一作用得到了巩固。<sup>20</sup> 随着信息交换量的增加,两国核风险降低中心之间的渠道对于确保信息交换的安全以及让双方对所接收信息的真实性充满信心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核风险降低中心的这一职能界限使它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和扩大,不仅可以促进新的双边军控安排下的数据交换,还能促进与盟国、伙伴国和国际组织的数据交换。美国 NRRC 在成立的第一年就根据双方谈判达成的两项协议与苏联交换了 1,800 条信息。在成立 10 周年之际,代理助理国务卿埃里克·纽瑟姆 (Eric Newsom) 表示,该中心“发送并接收了 15,000 份通知,涉及近 20 项协议”,并通过多项国际



协议“直接或间接与俄罗斯以外的 100 多个国家”进行沟通。<sup>21</sup>

1997 年,涉及的协议已经包括《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维也纳文件》和《化学武器公约》,明确地将 NRRRC 的作用扩展到核领域之外,涵盖对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的限制。2013 年,随着美国和俄罗斯开始根据网络建立信任措施的要求交换通知,网络领域也加入了其中。现在,美国 NRRRC 在与 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伙伴国共享网络事件归因数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通知制度的首次使用是在 2020 年秋季,用于报告 SolarWinds 网络攻击。<sup>22</sup>

这种扩张需要得到承认,美国 NRRRC 于 2021 年更名为“美国国家和核风险降低中心”。除了将更名写入法律之外,《第 34 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还重申了 NRRRC 作为一种机制,在促进降低风险和加强与有意愿的伙伴国沟通方面一贯重要的作用。后一点在美国 NRRRC 与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相应中心之间的渠道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些中心愿意在苏联解体后就单独的协议进行谈判。<sup>23</sup>此后,乌克兰成功更新了协议,并升级了与美国的通信链路,而哈萨克斯坦正在就更新协议进行谈判。

**图 1:**美国 NRRRC 每年交换的通知总数(传入和传出)显示了其服务的条约和协议的演变与扩展。某些类别的通知由于值太低,无法在此刻度范围上查看。完整数据请参见附录:美国 NRRRC 通知数据。

### 全球降低风险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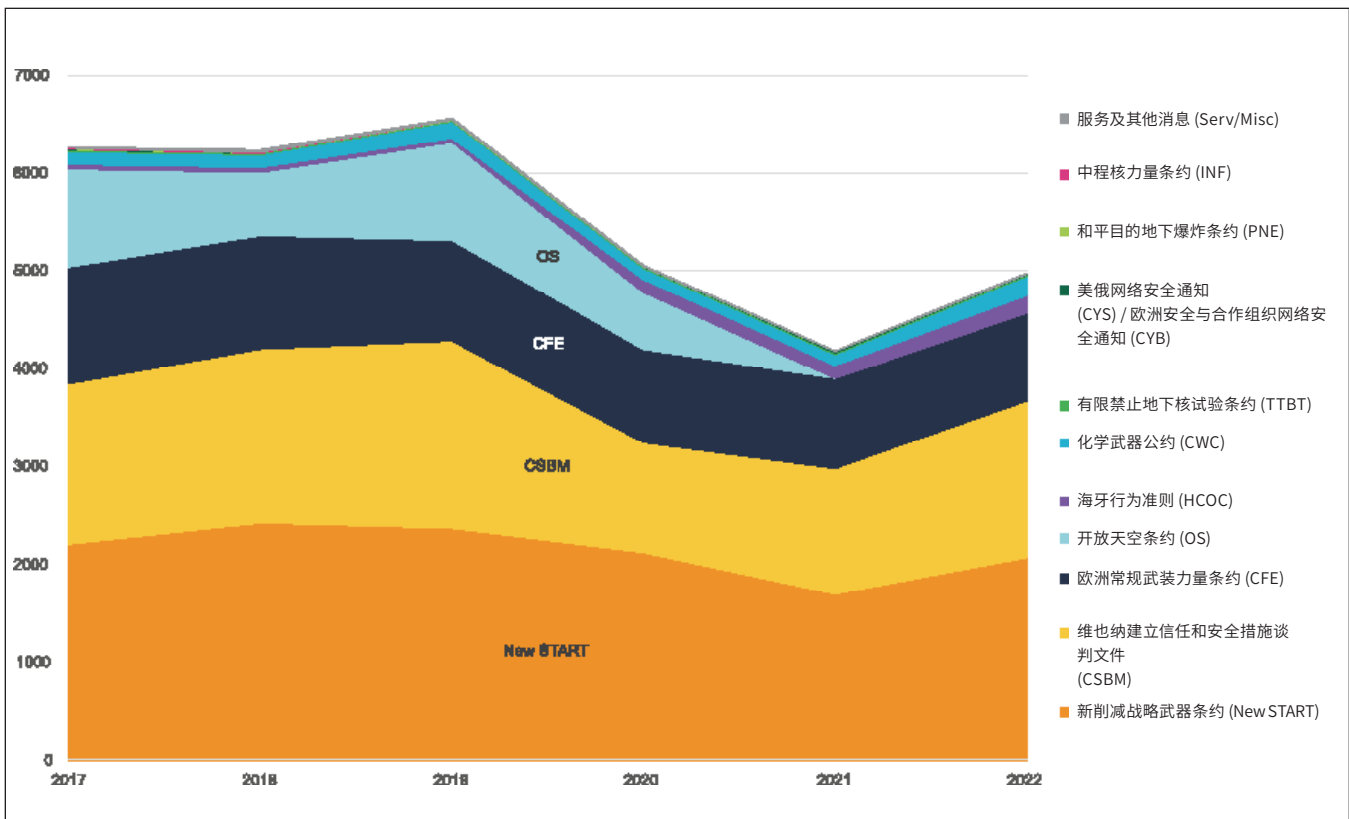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核风险降低中心当成工具,用于与比最初设计更广泛的对话者交换信息的国家。俄罗斯的对对应中心——国防部条约合规局,也开始根据《开放天空条约》和《维也纳文件》等其他国际条约

交换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还利用该中心按《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的规定交换通知。这两项协定是作为联合方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在 1996 年和 1997 年签订的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sup>24</sup>

1996 年签署的协定对军事演习的范围、地点和目的进行了限制,并就“商定的武装部队和边防部队组成部分”制定了年度数据交换时间表。该协定还引入了不使用部署在距两国边界 100 公里以内的部队相互对抗的概念。<sup>25</sup>1997 年签署的协定裁减了部署在中国边境 100 公里以内的军事力量,并规定这些驻扎在边境的部队“仅具有防御性质”,配套的核查机制包括每年进行 4 次检查。<sup>26</sup>无论是按照哪项协定的规定,通知都是通过“外交渠道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发送的。

美国和俄罗斯使用这些中心的方式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最近获得核能力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减少风险的努力中效仿的模板。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已计划采用类似的模式来作为建立其“战略风险降低中心”的可行方法。<sup>27</sup>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通过建立信任安排(包括《弹道导弹飞行试验预先通知协定》和《禁止攻击核装置和设施协定》)分享关键数据方面拥有一些经验。<sup>28</sup>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已经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来促进与俄罗斯的数据交换,但该国显然非常熟悉进行数据交换以及就执行《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的措施进行相互通知的概念。

事实上,美国和俄罗斯都灵活地扩大了其中心的作用,以促进与新合作国家的交流,这表明这种模式可以应用于任何包含数据交换和通知内容的协定。其他国家也可以采用该模式来执行其现有协定,并为新的外交安排铺平道路,无论是侧重于减轻战略风险还是预防地区危机。这些



**图 1:**美国国家与核风险抑制中心 (US NRRRC) 每年交换的通知总数 (传入和传出) 反映了其监测的条约和协议的演变和扩展。某些类别的通知数量太少,无法在这个数量级看到。完整数据见附录:美国 NRRRC 通知数据。

中心甚至不必与美国 NNRRRC 建立联系；正如其现任主任乔迪·丹尼尔 (Jody Daniel) 所指出的那样，风险降低中心和网络的普及本身就可以增强国际安全。由于每个国家节点都信任通过这些渠道接收到的信息的来源，因此因误解而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就会降低。<sup>29</sup> 反过来，敌对国和伙伴国之间加强沟通可能会提高国际透明度，并加强全球安全。

## 有意义的尝试

可以肯定的是，NRRC 促成的条约和通知的数量本身并不能表明这类中心在降低核风险方面的效力。同样，虽然这类中心职能的演变表明了体制的灵活性，但仅凭这种适应性并不能直接表明风险已经下降。为了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 NRRC 最初的使命，并评估 NRRC 成功实现或未能实现其基本目标的公开实例。

众所周知，衡量核使用风险这种无形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长期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专家团队一直致力于找出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来界定、分类和分析核风险，特别是在这些风险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演变的情况下。正如 2023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核战争与核恐怖主义风险分析方法》指出的，使核风险分析和衡量尤其具有挑战性的因素有两个：涉及核武器使用和恐怖主义的过往案例极度（也幸运得）罕见，以及这些风险对关键参与者的看法和意图的依赖。<sup>30</sup>

自 1945 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就再也没有使用过核武器，这一事实使得衡量任何特定风险降低措施有效性的过程变得复杂化。只要不再使用核武器，我们就默认这些措施是成功的吗？还是说，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俄罗斯等行为体蓄意操纵风险，表明了整个降低风险的事业是失败的？<sup>31</sup> 事实上，减少核风险和军备控制核心的基本假设——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必定有助于共同安全——是否正确？<sup>32</sup>

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管怎样，在评估 NRRC 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它们最初的使命，即减轻意外核升级的风险。虽然对于应对故意升级的风险可能需要改用其他策略和方法，但我们认为这些中心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判或误解的风险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中心的这一职能在如今困难的环境下尤为重要，因为任何误解或被曲解为不利的信号都可能演变成危机。

平心而论，几乎没有公开证据可以确定 NRRC 的危机预防职能与没有意外核对峙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自 NRRC 协议谈判以来发生的两起具体事件也许能让我们了解这些中心在减少此类风险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如果不使用这些中心则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两起事件分别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美军戒备事件，以及 1995 年挪威的“黑色布兰特 12”事件。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军队便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美国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向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传递讯号，表明此次行动并非针对俄罗斯。鉴于五角大楼的军方向通信链路出现故障，负责传递信息的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 (Richard Armitage) 便通过 NRRC 向俄罗斯对应中心传送了以下信息：“目前美国已进入三级戒备状态。升级戒备状态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由于当前的紧急情况。”<sup>33</sup> 这个例子展现了 NRRC 为提供清晰的信号，避免与对方沟通不畅而传输临时消息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是第一个致电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以提供援助的国家领导人。<sup>34</sup>

与此事件形成对比的是 1995 年的挪威-俄罗斯事件，当时俄罗斯预警系统监测到一枚“黑色布兰特 12 号”气象研究火箭的发射，促使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 (Boris Yeltsin) 将俄罗斯的战略力量调整至高度戒备状态。<sup>35</sup> 早在火箭发射前，挪威科学家已使用先前建立的程序向俄罗斯外交部发送了通知。然而，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该通知从未传入

俄罗斯国防部和指挥系统，导致值守预警系统的工作人员对挪威火箭发射一事一无所知。<sup>36</sup> 这差一点就引发了一场核战，叶利钦和他的最高军事领导层花了很长时间考虑是否启动他们的“核公文包”。此次事件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惊险的核战危机之一。

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如果挪威和俄罗斯更新了其科学导弹发射程序，让俄罗斯 NRRC 参与其中，那么这一特定的发射通知就会正确地找到其预期接收者，从而避免这一危险时刻。此事例与 9 月 11 日临时使用 NRRC 一事形成的对比表明，当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其行被误解时，清晰透明的沟通会有很大帮助。如果在危机时期采取此类降低核风险的措施，它们将有助于从双方无意威胁彼此的无用行动讯息中甄别出实际信号——蓄意的风险操纵和威胁。

这两个事例的对比说明了国家间达成一致的体制性机制的价值，其目标就是使某些通信常规化和无缝化。在降低核风险方面，有三个因素对政府来说很重要：(1) 有人接收通信，(2) 处理并将其传递给其他负责部门，以及 (3) 流程迅速。NRRC 已经保证，在美俄涉及条约的互动中，这三个因素都能得到满足。它们还确保两国政府通过协议和格式，以可预测的方式传递必要数量的信息。在一个错误/虚假信息正在以快速且不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信息格局的时代，能够依赖 NRRC 传递的信息非常重要。

因此，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及时性是分析 NRRC 表现的衡量指标中应考虑的三个特征。所以，尽管图 1 中报告的 NRRC 通知数量本身并不能表明风险降低，但确实反映了 NRRC 运作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及时性。从本质上讲，NRRC 为国家之间提供常规通讯以及几乎实时的消息传递，发挥着重要的可预测作用。在危机时期，这种可预测作用可能至关重要。

如果想更深入地研究这些特征，可以尝试分析常规 NRRC 信息从翻译到在政府部门之间传递需要多长时间。通过结果可以了解 NRRC 在履行其基本使命方面的表现如何。然而，它们是否能降低相关政府之间的风险，取决于谁阅读了这些消息以及他们如何反应。

## 保持线路畅通

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俄方领导人不断隐晦地发出核威胁时，美国竭力防止对俄方行动的任何误解，以免引发俄罗斯与北约 (NATO) 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导致核对峙升级。当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入侵之初宣布对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实行“特别值班机制”时，美国的反应是推迟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并且没有改变自己的核警戒级别。<sup>37</sup>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通过 NNRRRC 持续进行的信息交换；根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其他美俄协议的规定持续传递通知的过程有助于消除双方对战略力量调动的任何潜在误解。2022-2023 年，美国根据该条约发出了 1182 份通知，收到了 891 份来自俄罗斯的通知，数量水平与前几年相当。<sup>38</sup>

俄罗斯在 2023 年 2 月宣布非法中止实施《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要求美国停止支持乌克兰防务，并将此要求与其重新实施条约挂钩，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此双边渠道仍在运作。直到 2023 年 6 月，美国仍持续以单方面和自愿的方式发出通知，以激励俄罗斯继续履约。<sup>39</sup>

双方还承诺利用 NNRRRC 来执行《弹道导弹发射通知协议》。<sup>40</sup>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 (Sergei Ryabkov) 最近表示，“所有（与美国）对应的通信渠道都会定期进行测试，俄方有特定的技术程序来确保它们正常运行”，其隐含的意思与乔迪·丹尼尔所证实的情况都表明了同一件事——这些中心的技术操作员仍在持续发送日常服务信息（例如，有关系系统维护和测试信息，这类信息每天会发送多次。<sup>41</sup>

这些中心之所以没有提供一种手段来处理克里姆林宫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蓄意制造的核风险，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管理



这种蓄意制造的风险。尽管如此，美国和俄罗斯目前仍然依赖 NRRC 来传递弹道导弹发射通知和其他常规信息，这突显了这些中心在危机四伏的当下减少误解产生的作用，从而强化了避免意外核升级的最初使命。

## 结论和政策选择

从本质上讲，如今的 NRRC 仍在继续应对 1987 年设计时所面临的相同挑战：意外武装冲突和核升级的风险，尽管由于网络攻击能力的出现、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系统的交织以及生成性人工智能助长的虚假信息猖獗，导致这些风险增加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与冷战结束时相比，美国现在面临着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势均力敌的潜在竞争对手。这种三角关系使战略稳定因素变得复杂化，并加剧了意外升级的风险，尤其是在第三方可能参与的情况下。在此背景下，美苏/俄互动的历史为缓解战略风险提供了潜在的工具箱。

核风险降低中心可能就是这样的工具之一。它们的最终目的——稳定、安全和及时的通信——可能成为五核国框架下建立相互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英国、法国和中国可以建立属于自己国家的中心，这将使得所有五个国家都可以交换弹道导弹发射的通知，正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在 2023 年 6 月提议的那样。<sup>42</sup>

更广泛地说，这些中心可以促进关于核理论、核力量和核活动的持续对话，并允许各方分享五核国领导人在 2022 年 1 月重申的“防止未经授权或意外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措施”的数据。<sup>43</sup> 这些中心的更广泛议程将使它们回归 1983 年纳恩-华纳降低核风险工作组设想的最初目的。它们不仅可以作为交换信息的手段，而且如上文所述，它们还可以“就核理论、核力量和核活动建立对话”。<sup>44</sup> 俄罗斯联邦的一些专家似乎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建议美俄 NRRC 协议可以作为磋商的基础，而不是局限于近年来进行的有关升级 NRRC 的狭隘技术谈判。<sup>45</sup>

五核国了解参与多边降低风险以减少意外核升级可能的重要性。在五核国向 2022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提交的一份关于减少战略风险的工作文件中，所有五个核大国都强调了他们的共同愿望，即“通过减少误解、沟通不畅和误判的可能性，限制基于错误假设或由此导致的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该文件概述了推进降低风险工作的三个关键领域：“通过对话建立信心和可预测性”；“增加清晰度、沟通和理解”；以及“有效的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工具”。NRRC 是一种危机预防机制，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顺畅沟通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和及时的渠道，这些中心可以作为这些努力的基础。

五核国的 NRRC 网络提供了在危机时期维持政府间沟通的宝贵手段，并为未来多边协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开启五核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可考虑进行几次初步情况通报：

1. 关于五核国成员(如美俄、中俄、英法)间如何交换条约和协议执行的通知和信息的基本简报。此阶段应包括通知格式的详细描述，以及如何​​在谈判中达成这些格式。
2. 关于自建立联系以来的这些年间如何进行升级的技术简报，包括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升级的讨论。
3. 在外部专家(例如 Catalink)的参与下，就创新如何有助于未来的升级进行情况通报。<sup>46</sup>

在这些早期通报中，重要的是要确定精心制定的通知格式和协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创建一个常规的、预先商定的和实时的环境，以交换实施条约和协定所需的信息。这些通知本质上是预先授权的，不需要上一级负责人每次都来接电话。

此外，危机通信可以通过专为此目的商定的特殊通知来实现，可反映美国和俄罗斯 NRRC 目前传输临时信息的能力。尽管很少使用，但它会

立即被系统标记为特殊信息，并迅速触发收到该信息的政府内部的紧急通信。即使不能很快就政府内部沟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美国和俄罗斯也可以通过危机沟通演习等机制向五核国其他成员示范政府内部沟通的重要性。

在这一初始阶段进行的同时，重要的是，五核国应同时制定一项具体协议，要求定期通知行动。在 2022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五核国承诺在减少风险方面制定“措施、协议和行动”，达成弹道导弹发射通知协议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备选方案。<sup>47</sup> 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协议。<sup>48</sup>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也应该向五核国的其他成员国传达他们商定的通知和协议格式；它们可能与自 1988 年起实施的美俄导弹发射通知协议有一些相似之处。一旦北京和莫斯科有机会就如何在双边基础上交换导弹发射通知进行传达，就可以将这些过程与美俄导弹发射通知及协议进行比较，并在整个五核国之间进行讨论。这一过程的结果将作为一个模板，推动弹道导弹发射通知扩展到整个五核国。

一旦五核国所有成员国都习惯了常规的通知交换，就有可能通过 NRRC 协议在五核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同的技术平台。这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有许多政策和技术先例可供借鉴。在这个关键时刻，五核国或许还希望考虑一下，它们可以运用哪些技术创新来使通信链路更具弹性、响应时间更快。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强调，“保持线路畅通”不仅适用于当前与俄罗斯之间的严重危机，也适用于未来涉及更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潜在危机。鉴于中国政府完全无法适应脱离上层持续监督的例行沟通，我们必须思考五核国在降低风险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有哪些。如果能够将这种通信交换方式的常规可预测性理念传达给北京，也许中国对此类核风险降低措施的放心程度将会提高。

毫无疑问，要说服中国认识到 NRRC 的价值并同意建立自己的版本，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在 2023 年 8 月提交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筹备委员会的文件中，中国提出了一项基本原则：“坚持危机预防优先于危机控制。各国应摒弃一边呼吁减少核风险，一边煽动对抗、制造危机的虚伪做法，把预防危机放在首位。”<sup>49</sup>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这些中心通过促进在核、常规、化学和网络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和军备控制条约，对其最初目的——减少意外的核风险——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个不间断运行的危机预防机制，这一美俄渠道将两国政府之间例行且透明的沟通行为制度化，并已证明能够充分适应新协议和新出现的挑战。如此一来，这些中心完全践行了中国坚持危机预防优先于危机控制的原则。

NRRC 发送临时消息的能力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并进一步减少了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尽管透明通信与安全之间的关联并非不证自明，但我们认为，在如今这样的危险时期，意外误解演变成全面升级的风险非常高，那么相互间的可预测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应地，减少意外风险的中心也为制定有效应对蓄意威胁的措施创造了更多空间。

无论未来会如何发展，核风险降低中心已经兑现了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时的大部分承诺。如今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让这些中心在降低核风险方面承担更多职能？

## 附录: 美国 NNRRC 通知数据

以下数据展示了 2017 年至 2022 年间美国国家和核风险降低中心处理的传入和传出通知数量。此数据由该中心主任乔迪·丹尼尔提供给作者。

NNRRC 通知 2017-2022 (传入和传出)												
协议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传入	传出	传入	传出	传入	传出	传入	传出	传入	传出	传入	传出
Serv/Misc	4	6	19	8	6	7	10	2	0	2	10	2
INF	8	4	4	2	2	0						
PNE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CYS/CYB	4	4							14	1	2	1
TTBT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CWC	56	76	53	78	70	101	59	59	47	66	77	122
HCOC	0	46	0	48	13	31	61	70	69	63	66	114
OS	921	80	582	65	915	89	533	45				
CFE	1136	55	1110	48	974	50	909	48	891	34	844	55
CSBM	1608	35	1744	40	1885	33	1100	24	1253	23	1561	36
New START	1035	1172	941	1479	854	1514	825	1295	677	1027	891	1182

### 缩略语

NNRRC—National and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美国国家和核风险降低中心)

INF—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中程导弹条约》)

PNE—Treaty on Underground Nuclear Explosions for Peaceful Purposes(《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

New START—New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TTBT—Threshold Test Ban Treaty(《有限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

CFE—Treaty on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CSBM—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of the Vienna Document(《维也纳文件》信心与安全建立措施)

CWC—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化学武器公约》)

HCOC—Hague Code of Conduct(《海牙行为守则》)

OS—Open Skies Treaty(《开放天空条约》)

CYS—US-Russian Cybersecurity Notifications(美俄网络安全通知)

CYB—OSCE Cybersecurity Notifications(欧安组织网络安全通知)

Serv/Misc—Service and Miscellaneous Messages(服务及其他讯息)



## 尾注

- 1 作者衷心感谢斯坦利和平与安全中心对本文的支持,并感谢 2023 年夏季斯坦利中心两次研讨会的所有参与者提供的宝贵反馈。
- 2 有关 NRRR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s (and Protocols Thereto)(《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建立核风险降低中心的协定》(及其议定书)), 美国科学家联盟, <https://nuke.fas.org/control/nrrrc/docs/nrrc1.htm>; 美国国务院, “Renaming of the National and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 (美国国家和核风险降低中心更名)”, 2021 年 2 月 8 日, <https://www.state.gov/renaming-of-the-national-and-nuclear-risk-reduction-center/>; 美国国务院, United States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 (NRRRC) (《美国核风险降低中心 (NRRRC)》), 2012 年 10 月, <https://www.hsdl.org/c/abstract/?docid=724411>。
- 3 Preventing Nuclear War: A Realistic Approach (《防止核战争: 一个现实的方法》), Barry M. Blechman 主编(布卢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第 175 页。
- 4 同上
- 5 同上
- 6 “直到 1990 年, 美国情报机构才进行了彻底的事后剖析, 揭露了苏联根深蒂固的焦虑。”参见 The Soviet “War Scare” (《苏联“战争恐慌”》), 美国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 1990 年 2 月 15 日, 2015 年 10 月 14 日解密, <https://www.archives.gov/files/declassification/isicap/pdf/2013-015-doc1.pdf>。
- 7 “切尔尼亚耶夫的加入是对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俄罗斯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 KAL-007 被击落后紧张氛围下的谈话记录作出的反应。”参见 The Diary of Anatoly S. Chernyaev (《阿纳托利·S·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3 年, Anna Melyakova 译,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 2023 年 5 月 25 日,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30343-diary-anatoly-s-chernyaev-1983>。
- 8 Pavel Aksenov, “Stanislav Petrov: The Man Who May Have Saved the World (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 可能拯救世界的人)”, BBC, 2013 年 9 月 26 日,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4280831>。
- 9 Soviet “War Scare” (《苏联“战争恐慌”》), 第 73 页; Nate Jones 和 David E. Hoffman, “Newly Released Documents Shed Light on 1983 Nuclear War Scare with Soviets (新发布的文件揭示了 1983 年苏联引发的核战争恐慌)”, 《华盛顿邮报》, 2021 年 2 月 17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soviet-nuclear-war-able-archer/2021/02/17/711fa9e2-7166-11eb-93be-c10813e358a2\\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soviet-nuclear-war-able-archer/2021/02/17/711fa9e2-7166-11eb-93be-c10813e358a2_story.html)。
- 10 “Anatoly S. Chernyaev Diary (《阿纳托利·S·切尔尼亚耶夫日记》), 1983 年”,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 2023 年 5 月 25 日, <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russia-programs-russian-pages/2023-05-25/anatoly-s-chernyaev-diary-1983>。
- 11 第 130 卷国会记录 16684 (1984 年),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GPO-CRECB-1984-pt12/pdf/GPO-CRECB-1984-pt12-4.pdf>。
- 12 “Joint Soviet-United States Statement on the Summit Meeting in Geneva (苏美关于日内瓦首脑会议的联合声明)”, 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 1985 年 11 月 21 日,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joint-soviet-united-states-statement-summit-meeting-geneva>。
- 13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协定》。
- 14 “Remarks on Signing the Soviet-United States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s Agreement (关于签署苏美核风险降低中心协议的评论)”, 载于《美国总统公开文件: 罗纳德·里根》, 1987 年, 第 2 册(华盛顿特区: 政府印刷局, 1989 年), 第 1033 页-第 1034 页,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PPP-1987-book2/pdf/PPP-1987-book2.pdf>。
- 15 Mitchell Reiss, “Crisis Management Mechanisms: How Much Is Enough? (危机管理机制: 多少才够?)”, 《军备控制》第 10 卷, 第 2 期(1989 年): 第 114 页, <https://doi.org/10.1080/01440388908403904>; Barry Blechman, “A Minimal Reduction of a Major Risk (最小化降低主要风险)”, 《原子科学家公报》, 1988 年 4 月, 第 45 页,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963402.1988.11456137>。
- 16 “US-Soviet Bilateral Exchanges Since the Geneva Summit (自日内瓦峰会以来的美苏双边交流)”, 1986 年 5 月 23 日, 2011 年 5 月 24 日解密, 可通过 CIA FOIA 阅览室查阅, 第 4 页,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86T01017R000505060001-4.pdf>; “US-Soviet Bilateral Contacts (美苏双边接触)”, 1987 年 6 月 22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解密, 可通过 CIA FOIA 阅览室查阅, 第 19 页,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90T00114R000800230001-5.pdf>。
- 17 Barry M. Blechman, Michael Krepon,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s (《核风险降低中心》),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1986 年, 第 14 页, [https://www.stimson.org/wp-content/files/file-attachments/Risk%20Reduction%20Centers\\_BlechmanKrepon\\_1986.pdf](https://www.stimson.org/wp-content/files/file-attachments/Risk%20Reduction%20Centers_BlechmanKrepon_1986.pdf)。
- 18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Nuclear Age (《核时代的危机管理》), 1987 年, 华盛顿特区: 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 第 32 页, doi: 10.17226/10459。



- 19 Rose Gottemoeller 和 Marshall L. Brown Jr., “Legal Aspects of Russia’s New START Suspension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US Policy Makers (俄罗斯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法律问题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机会)”, 《原子科学家公报》, 2023 年 3 月 2 日, <https://thebulletin.org/2023/03/legal-aspects-of-russias-new-start-suspension-provide-opportunities-for-us-policy-makers/>.
- 20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res (NRRC) 10th Anniversary (核风险降低中心 (NRRC) 成立 10 周年)”, 《裁军外交》第 25 卷(1998 年 4 月), <http://www.acronym.org.uk/old/archive/25nrrc.htm>.
- 21 Jody Daniel, 作者访谈, 2023 年 5 月 1 日。
- 22 同上
- 23 “Паспорта и текст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и соглашений по ограничению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и вооружений, укреплению мер доверия в во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в которых принимает участи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俄罗斯联邦参加的关于军备控制和建立军事信任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的护照与文本)”, 俄罗斯国防部, 2022 年 7 月 19 日存档,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719133131/https://doc.mil.ru/documents/quick\\_search/more.htm?id=10941638@cmsArticle](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719133131/https://doc.mil.ru/documents/quick_search/more.htm?id=10941638@cmsArticle);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хстан,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о взаимном сокращени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 районе границ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访问, <http://treaty.mfa.gov.cn/tykfiles/20180718/1531876780798.pdf>.
- 24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1996 г.(Шанхайское) (1996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协议(上海协定))”, 俄罗斯国防部, 2021 年 11 月 21 日存档,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121003145/https://doc.mil.ru/documents/quick\\_search/more.htm?id=10947126@egNPA](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121003145/https://doc.mil.ru/documents/quick_search/more.htm?id=10947126@egNPA).
- 25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1997 г.(Московское) (1997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协议(莫斯科协定))”, 俄罗斯国防部, 2022 年 9 月 1 日存档,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901063547/https://doc.mil.ru/documents/quick\\_search/more.htm?id=10947127@egNPA](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901063547/https://doc.mil.ru/documents/quick_search/more.htm?id=10947127@egNPA).
- 26 Feroz Hassan Khan, “Strategic Risk Management in Southern Asia (南亚的战略风险管理)”, 《和平与核裁军杂志》第 5 卷, 第 2 期, 第 369 页-第 393 页,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epdf/10.1080/25751654.2022.2136878?needAccess=true&role=button>.
- 27 Agreement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on Pre-Notification of Flight Testing of Ballistic Missiles (《印度和巴基斯坦弹道导弹飞行试验预先通知协定》), 史汀生中心, 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访问, <https://www.stimson.org/2012/agreement-between-india-and-pakistan-on-pre-notification-of-flight-test/>; Agreement on the Prohibition of Attack against Nuclear Installations and Facilities (《禁止攻击核装置及设施协定》),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访问, <https://nuke.fas.org/guide/india/doctrine/nucl.htm>.
- 28 Daniel, 采访, 2023 年 5 月 1 日。
- 29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 Risk Analysis Methods for Nuclear War and Nuclear Terrorism (《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风险分析方法》), 华盛顿特区: 国家科学院出版社, 2023 年, 第 3 页, <https://doi.org/10.17226/26609>.
- 30 Heather Williams, “What We Got Wrong about Nuclear Risk Reduction (我们对降低核风险的错误认识)”, 《国会山报》, 2022 年 5 月 23 日,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3497843-what-we-got-wrong-about-nuclear-risk-reduction/>.
- 31 Jane Vaynman, “Better Monitoring and Better Spy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merging Technology for Arms Control (更好的监测与更好的情报工作: 新兴技术对军备控制的影响)”, 《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第 4 卷, 第 4 期(2021 年秋季), <https://tnsr.org/2021/09/better-monitoring-and-better-spying-the-implications-of-emerging-technology-for-arms-control/>.
- 32 Daniel, 作者访谈, 2023 年 5 月 1 日; 美国国务院, United States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 (《美国核风险降低中心》); Jody Daniel, “National and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 (美国国家和核风险降低中心)”, 与作者分享的汇报资料。
- 33 “9/11 a ‘Turning Point’ for Putin (9/11—普京的“转折点”)”, CNN, 2022 年 9 月 10 日, <https://edition.cnn.com/2002/WORLD/europe/09/10/ar911.russia.putin/index.html>.
- 34 “The Norwegian Rocket Incident (The Black Brant Scare) (挪威火箭事件(黑色布兰特恐慌))”, 军备控制与防扩散中心, 2022 年 10 月 14 日, <https://armscontrolcenter.org/the-norwegian-rocket-incident-the-black-brant-scare/>.
- 35 Peter Vincent Pry, War Scare: Russia and America on the Nuclear Brink (《战争恐慌: 濒临核边缘的俄罗斯与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 普拉格出版社, 1999 年), 第 217 页-第 218 页。
- 36 Phil Stewart 和 Idrees Ali, “Exclusive: U.S. Cancels ICBM Test Due to Russia Nuclear Tensions (独家报道: 美国因俄罗斯核紧张局势取消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路透社, 2022 年 4 月 1 日,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exclusive-us-cancels-icbm-test-due-russia-nuclear-tensions-2022-04-01/>.



- 37 Daniel, 通讯, 2023 年 5 月 3 日。
- 38 “U.S. Countermeasures in Response to Russia’s Violations of the New START Treaty(美国针对俄罗斯违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反制措施)”, 美国国务院, 2023 年 6 月 1 日, <https://www.state.gov/u-s-countermeasures-in-response-to-russias-violations-of-the-new-start-treaty/>。
- 39 同上;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uspending the Treaty on Measures for the Further Red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 (New START)(外交部关于俄罗斯联邦暂停履行《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声明)”, 俄罗斯外交部, 2023 年 2 月 21 日, [https://mid.ru/ru/press\\_service/spokesman/official\\_statement/1855184/?lang=en](https://mid.ru/ru/press_service/spokesman/official_statement/1855184/?lang=en)。
- 40 “Рябков сообщил о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контакта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里亚布科夫透露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定期进行电话联系)”, 塔斯社, 2023 年 5 月 26 日, <https://tass.ru/politika/17851219>; Daniel, 访谈, 2023 年 5 月 1 日。
- 41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for th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ACA) Annual Forum(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军备控制协会(ACA)年度论坛上的讲话)”, 白宫, 2023 年 6 月 2 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6/02/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for-the-arms-control-association-aca-annual-forum/>。
- 42 “Joint Statement of the Leaders of the Five Nuclear-Weapon States on Preventing Nuclear War and Avoiding Arms Races(五核国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白宫, 2022 年 1 月 3 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1/03/p5-statement-on-preventing-nuclear-war-and-avoiding-arms-races/>。
- 43 Preventing Nuclear War《防止核战争》, 第 172 页-第 173 页。
- 44 Elena Chernenko, “Это все, что останется после него(这就是之后剩下的一切)”, 《生意人报》, 2023 年 4 月 8 日,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925040>。
- 45 “CATALINK”, 安全与技术研究所, <https://securityandtechnology.org/catalink/>。
- 46 “Joint Statement of the Leaders of the Five Nuclear-Weapon States(五核国领导人联合声明)”。
- 47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讲话)”。
- 48 参见“Nuclear Risk Reduction(减低核风险)”, 中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NPT/Conf.2026/PC.I/WP.30, 2023 年 8 月 2 日。



### 关于作者

Rose Gottemoeller,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 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在加入斯坦福大学之前, Gottemoeller 曾于 2016 年至 2019 年担任北约副秘书长, 帮助推动北约适应欧洲和反恐斗争中新的安全挑战。在加入北约之前, 她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近五年, 就军备控制、防扩散和政治军事事务向国务卿提供建议。在 2009 年和 2010 年担任负责军备控制、核查和合规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期间, 她是美国与俄罗斯联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的首席谈判代表。



Daniil Zhukov 目前正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战争研究硕士学位。此前, 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担任 Rose Gottemoeller 的研究助理, 研究一系列与核武器控制和美俄关系相关的问题。Dan 出生于俄罗斯,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历史和政治学学士学位。

“Analysis & New Insights” 为有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公开讨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论点。本简报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并不代表斯坦利和平与安全中心的观点。



### 关于我们

The Stanley Center for Peace and Security 与个人、组织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合作, 以推动三个问题领域——减缓气候变化、避免使用核武器以及防止大规模暴力与暴行——的政策进展。该中心成立于 1956 年, 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开辟论坛。欲详细了解我们最近的出版物和即将举行的活动, 请访问 [stanleycenter.org](http://stanleycenter.org)。



### 关于 RUSI

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 (RUSI) 是一家独特的研究所, 由惠灵顿公爵于 1831 年创立, 凝聚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对国防和安全事务的前瞻性思考、自由讨论和认真反思。

RUSI 虽是一家英国研究所, 但却放眼全球, 始终以国际视角运作。内罗毕和布鲁塞尔的办事处增强了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多年来, 我们在质量和客观性方面积累了卓越的声誉。RUSI 历史悠久, 地理位置优越, 位于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的核心地带, 在政府内外拥有广泛联系的同时, 始终保持严格独立, 这些因素使得研究所拥有独特的洞察力和权威性。欲了解详细信息, 请访问 [rusi.org](http://rusi.org)。

